



“文学陕军”砥砺前行 奏响新时代嘹亮号角

陕西省作家协会

4月的三秦大地、到处春意盎然。习近平总书记相隔五年重返陕西视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令“文学陕军”感到格外振奋和鼓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发表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各方面工作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对宣传思想和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陕西的亲切关怀和厚望。回眸“文学陕军”五年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感到欣慰的是“文学陕军”坚定前行、硕果累累、阵地牢固、守正创新、不忘初心；展望未来感到振奋的是“文学陕军”勇于担当使命、充满前进的动力、增强了攀登的底气。

五年来，“文学陕军”坚定前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按照省委的安排部署，围绕文学陕军再进军这个目标，实施抓首要、出人才、出精品、强阵地、促改革五大战略，实施重点工作、职能工作、专项工作等八大任务，采取100余项具体措施，特别是通过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落实省委《陕西省作协深化改革方案》，举办高规格柳青文学创作研讨会，评选第五届柳青文学奖，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弘扬陕西现实主义文学优良传统，实施“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扶持计划”，推进“签约作家”制度，成立陕西青年文学协会、网络作家协会，与鲁迅文学院等合作举办“陕西作家班”，大力培养文艺人才，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机构与媒体、陕西各大学文学院加强联系，促进文学交流合作，召开“改革开放与路遥的创作道路”研讨会，坚定文化自信和强烈使命担当，激励广大作家向经典看齐、向大师学习，提高了文学影响力，文学队伍数量庞大、结构合理、后劲强劲，不断向文艺“高峰”迈进。

五年来，“文学陕军”硕果累累。全省每年推出各类文艺图书近3000部。近百位作家的700余篇(部、首)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诗刊》等国家级刊物和重点刊物发表。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作家路遥“改革先锋”称号，中宣部等部委授予路遥、负鼠等“最美奉献者”。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阎安的诗集《整理石头》、穆涛的散文集《先前的风气》，分别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和散文杂文奖。弋舟的短篇小说《出警》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白鹿原》《浮躁》《平凡的世界》《人生》4部作品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保卫延安》《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秦腔》《装台》等作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贾平凹、高建群、叶广岑、莫申、陈彦、王海、李康美、和谷、安黎、冯积岐、吴克敬、方英文、龙云、朱鸿、冷梦、张虹、厚夫等一批作家先后荣获全国有关报刊、省市举办的百余个重要奖项。李国平、弋舟，以及冯希哲、王妹英、李小洛、周瑄璞、杜文娟、李尚洁等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陕西文学名著改编影视剧，掀起西部影视热潮，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百优作家、中青年作家积极融入火热的社会生活，围绕重大主题、重要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等主题，创作推出《张富清传》《西

迁人》《穿越秦岭》《脱贫英雄》《绿满秦巴》《精耕记》《剑气扬眉》《大清官》《第一书记扶贫手记》等优秀作品，李春平、高鸿、周瑄璞、陈仓、冯北仲、陈毓、钟法权、王妹英、杨辉、贝西西、王闷闷、周子湘、庞文梓、邢小俊、侯波、王晓云、寇辉、马语、李小洛、李育善、吕学敏、王为民等一批优秀中青年作家在全国影响力不断提升，充分展现了“文学陕军”与时代同步、以精品奉献人民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果。

五年来，“文学陕军”阵地牢固。加强文学阵地管理，把握正确的创作方向。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省委宣传部主管、省作协主办的《延河》《小说评论》等文艺期刊坚持大刊、名刊品质和定位，专业品质和专业影响力得到不断提升。《小说评论》连续多年入选CSSCI来源期刊，《延河》杂志转载率稳步提升。抓好阵地管理和舆论引导，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持“三审三校”“三重三重”等制度，牢牢把住文学阵地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昂扬精气神。不断拓宽办刊思路，邀请全国名家驻刊、主持专栏，提升刊物质量水准，《延河》每年不少首发作品入选各类选本、榜单，《小说评论》每年都有首发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两刊都位列“全国文学报刊联盟理事单位”，巩固了陕西文学重镇的地位。先后推出“脱贫攻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抗击疫情”“柳青研究”等主题专栏、专辑、专号，主动以文学的方式呼应时代的主流，展

现出文学陕军观照时代、融入时代的情怀。《陕西文学界》、陕西作协网、“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围绕各自职责定位开展编务工作，积极探索融媒体发展思路和手段，建立刊物、网站、微信、头条资源共享、同步推广的机制，促进优秀文学作品的多渠道传播，极大活跃了基层文学的氛围。被中国作协授予“舆情信息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主动加强对研讨交流活动的审批管理。严格审核各类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的内容和方向，先后举办“柳青创作精神”“卅年重聚说路遥”等研讨会，梳理文学陕军的精神财富，弘扬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学氛围。做好陕西文学陈列室的管理，努力打造优质阵地。抓好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和“学习强国”平台推广应用。常态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机关”，积极树立宣传先进典型。深化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开展诚信缺失问题专项整治。

五年来，“文学陕军”守正创新。认真落实省委办公厅印发的《省作协深化改革方案》，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从为作家免费送《文艺报》等小事做起，努力为作家排忧解难，建立温馨的作家之家。制定《陕西省作家协会关于作家定点体验生活的暂行办法》，选派一批作家赴基层挂职、定点深入生活，奔赴陕西追赶超越一线，深入举行采访、采风活动。改革完善机构设置，修订“三定”方案，优化部门设置和职能配备，建立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修订省作协《章程》。积极推动基层作协建设，延安市、铜川市、延川县作协落实机构编制，成为深化作协改革的

“陕西经验”。认真推动实施“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资助计划”“签约作家”等专门人才项目实施，加强跟踪服务。深化作家培训机制改革，采取直接培训和委托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先后举办“全省脱贫攻坚中青年作家培训班”“百优计划与百人计划培训班”“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培训班”等专题培训班十余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出台《干部平时考核办法》《干部轮岗办法》，对干部严管厚爱，持续激发干部人才的动力活力。积极推动陕西文学馆、陕西作家展览馆、作家数据库建设项目，出台《文学陕军再进军工程实施方案》等四个重要政策文件，与阿里文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主动加强与青年文学协会、网络作家协会、新兴文学群体的联系，加强文学社团管理，推动文学陕军高质量发展。加强文学对外交流和公益服务工作，接待韩国、哈萨克斯坦、波兰、北美等多个作家代表团来陕考察交流，举办“故事里的中国——外国专家进陕采风活动”。积极举办“文学陕军读书会”“小文学陕军进作协”等文学公益活动。通过优秀作品传播中国价值、陕西形象。筹拍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老作家资料片。

五年来，“文学陕军”不忘初心。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记“文学陕军”从延安走来的光荣历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省委要求，坚持落实民主集中制，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党组书记的首要职责、第一政治任

务。严格遵守党组工作条例，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三重一大”必须上党组会研究决定，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监督，确保了党的方针政策在省作协落地落实。坚持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积极开展读书活动。加强党员培训，发挥“三会一课”作用，深化“对标定位、晋级争星”活动，深化党员积分管理，提高党员发展质量，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按期召开机关党委成立大会，成立机关党委和机关纪委，按时完成机关党组织换届，夯实党建工作组织基础。发挥机关纪委作用，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把文学专委会和各支部衔接，实现党建与业务融合，把机关党委工作延伸到各个文学专委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入开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坚持刀口向内，发扬斗争精神，形成了《省作协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制定落实了《省作协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整改方案》。汲取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的教训。肃清赵正永的流毒，坚决划清界线。以魏民洲、冯新柱、钱引安、陈国强等案件为警示，做到警钟长鸣。支持机关纪委工作，按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思路，紧盯重点岗位、重点人员、重点环节和重点节日，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各项规定的落实与监督。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全年发文数量减少30%。全面实施宪法法律，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法治建设的要求，按照作协章程办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在各项工作中严格遵法守法执法。认真贯彻党内法规制度，推动依规治党落到实处。坚持规范性文件必须经过合法性审核，落实律师制度，依法维护作家合法权利。加强扶贫攻坚工作，完成驻村联户工作，如期实现帮扶村脱贫摘帽。积极争取和完成财政资金及项目。

五年来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重要论述在学懂弄通做实上还有差距，推动文学创作创新创造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服务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2020年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完成“十三五”规划的收官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作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按照省委的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搞好工作的总遵循，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按照省委的要求，围绕重大主题、重大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文学创作，推出一批精品力作。弘扬“延安精神”，以柳青同志为榜样，培养自觉担当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的新时代文学陕军，自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扎实推动文学陕军再进军，做大做强“文学陕军”品牌。围绕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着力扩大开放，积极创造条件、整合资源，打造“丝绸之路”文学人文交流基地，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接第1版)

记者：确实如此，文学本来就需要爱和情感贯穿其中，只有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更多的读者。您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其中的细节吗？

何建明：记得2月14日这个特殊的情人节，我特意从浦东乘摆渡船过了黄浦江，来到对岸的虹口区，来到了传说中上海最浪漫的“爱情街”，去寻找和近距离感受这座时尚都市的“爱之源”。甜爱路改革开放之后慢慢被上海年轻人当成“爱情圣地”，于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们就把甜爱路当作“定情地”“许愿地”和“牵手地”，甚至“山盟海誓地”。虹口社区因势利导，便将这条“甜爱路”打造成现今的“上海第一浪漫街”。

散步在这条被两边高大葱绿的水杉树掩蔽的幽静小马路，一边默念着挂在街墙上的28块“名人论爱情”经典语录，再看长长的“爱情墙”上不知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在此涂鸦的各式各样的图案与句句“爱情宣言”，一股浓浓的清香甜美的爱情味道，会令你心底缓缓升腾而起……疫情下的上海情人节，我看到已经有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尽管他们戴着口罩，但他们仍然手牵着手，不时地在爱情墙上画着、写着他们的“爱情鸟”与“爱情宣言”。我还看到一对70多岁的老人也手拉着手，漫步于爱情浓浓的小街上。

我走上去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是不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他们停住脚步轻声地告诉我，他们已经是金婚了，每年情人节都要到这里重温爱情的热度。今年也一样，虽然病毒能“伤害”大家的身体，可不能咬坏他们。阿娟请我替他们拍张照片。我忙摆开架势，连连帮他们“咔嚓”了几下。那一刻，我被“爱情街”上的这两位老人和身边走过的每一对恋人所感动。自然，当我回到黄浦江边摆渡的时候，重新展望疫情即将过去的大上海时，心头难抑激荡和飞翔的感情……

我想对上海歌唱，歌唱她的美丽，她对我们的爱。我还在想：假如一个城市、一块土地，她保护了我们的生命，并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精彩，我们自然应该向她致敬！

(李晓晨)

吴若增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吴若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月4日在天津逝世，享年76岁。

吴若增，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离异》，短篇小说集《翡翠烟嘴》、中篇小说集《鲁豫》、杂文随笔集《孤独的诉说》等。



陈爽

中国小说观念研究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是，诸多名为“小说”的概念，其含义却不尽相同，因而研究者往往纠缠于名实之间，不得脱身。为了尽可能清晰界定，一些研究者做出“古小说”与“古典小说”的界分。而在近现代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无怪乎胡怀琛感慨道：“不但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和中国现代的小说(就是受过西洋文学的洗礼而创造的小说)是同名异实；就是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也有同名异实的。”我们通常认为，西方小说观念的引入促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嬗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小说观念的改变决非一蹴而就，而是反复交织于传统与新变中，民国初年正是这样一个多元观念共生的时期。在考察这一时期小说观念时，传统的余响是我们不该忽略的一种力量。

提到中国古代小说，自然使人想到小说与史家的关联，班固将小说称之为“街谈巷议”，其后又有“稗官野史”“史家之余”“正史之阙”“正史之余”等说法。在历代史书与目录学著作中，小说与史家的密切关系更是随处可见。“补史”观念延宕至民国，成为当时人阅读与理解小说的基本底色。尽管民国初年的人们在阅读和评价小说时，并不以能否“补史”作为唯一标准，在公开场合关于“小说补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多，但是保持这种传统见解的人依旧数量可观。以翻译西方小说而闻名的林纾，在记录见闻的“笔记”《戩余小说》自序中便表现出这种向传统的回归。他认为“盖小说一道，虽有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见闻，或且出诸传说，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

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蔽帚之簞。”

民国初年小说延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补史”观念，体现于具体的小说创作与报刊杂志栏目上。以前者而论，蔡东藩作《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并自诩“良小说”，可侔于古之“良史”。以后者而论，与“古小说”史传传统关系密切的“笔记”在民初盛行，《礼拜六》《小说丛报》等畅销杂志多专设“笔记”“笔记小说”“札记小说”“杂记”“杂俎”等栏目，登载笔记作品。“笔记”的兴盛状况甚至引起了新文学人物的关注与警觉。罗家伦、胡适等人都对此种状况进行批评，或指出其思想方面的缺失，或从体式上将其排除在“短篇小说”之外。我们不妨以曾受罗家伦批评的《小说月报》为例，以备一隅之观。

1912年恽铁樵接手《小说月报》编辑后，在该杂志第三号中征求“专记各省革命时之遗闻轶事”的革命外史作品，他本人在第四号以笔名“焦木”发表了“时事小说”《火花一幕——革命外史之一》，这篇小说的后记比小说本身更值得关注。在后记中，恽铁樵表达了写作这类“革命外

史”作品的痛苦，这种痛苦实质源于两种小说观念的龃龉。一方面恽铁樵受到域外小说观念影响，认为小说为“海市蜃楼”，应允许虚构；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小说“补史”观念而“据事直书”。在随后的第五期他发表了《鞠有黄花——革命外史之二》，此后并未发表这类革命外史小说。

恽铁樵的搁笔说明其意识到两种小说观念的尖锐矛盾而难以决断，同时他却另有人保持对小说“真实性”的固执要求。1915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号上刊登了读者许与澄的来信，许与澄认为《小说月报》中的“掌故小说”应严格遵循真实主义，不应臆造，而且应当特别标明“记事”“实事”等字样，他希望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广见闻，这正是深受小说“补史”观念影响的一种观点。无独有偶，《小说月报》在1915年第三号“本社函件撮录”中刊登了陈通甫对钱基博小说《石勇》的批评，并附载钱基博对此批评的回应。《石勇》是钱基博1914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是受林纾文字峻洁的“笔记”《技击余闻补》中的一篇，主要讲述温州东乡人石勇颇有异能，经寺僧推荐做了福建的“经略大臣”，后在中日海战中因预判敌舰到来而立功，官至福建水师提督的故事。陈通甫对《石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小说缺乏真实性，他指出前清光绪二十年福建既无“经略大臣”，甲午后“福建水师提督”中也无名为石勇者。此外，陈通甫还对《小说月报》停载“掌故小说”大家许指指的作品表达了不满，在他看来“指严君秘史为第一”。而令人诧异的是，钱基博在回应中声称《石勇》这则故事是据实而录，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或许有所偏差而造成了“如是我闻”“姑妄听之”的情况，钱基博进而讽刺道“史书宰相表，其何人止伯什数，然能道姓氏于人人者，宁有几哉？”陈通甫如何能够做到“果系贵官，一经提起姓名，脑中应有痕蒂”。

不论是恽铁樵写作“革命外史”时的内心痛苦，还是许与澄对小说“真实性”的执拗要求，以及陈通甫和钱基博围绕《石勇》的争论，这些都呈现了小说“补史”观念在民国初年的延续。在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传统仿佛一种余响，以深远与持久的方式，在这些“新”观念中沉默地打下自己的烙印。



林纾画像